

《箫声剑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箫声剑影》

13位ISBN编号：9787563397877

10位ISBN编号：7563397876

出版时间：2010.5.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绪贻

页数：3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前言

序言中科院资深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刘绪贻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和绪贻是清华同学，但在校时我们并不认识，因为我们在两个学院，我在理学院，他在法学院。后来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我学气象学，他学社会学。但我们住在一起，因而就逐渐认识了。一个人到了异国他乡，和本国文化完全不同的一个新国家，想融入一个新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熟悉新环境和新文化就需要花些时间。我们两人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很快就都熟悉并比较快地融入美国社会了。我们两人都有很多很要好的美国朋友，当然也都有不少中国朋友。但是，在众多朋友中，能够彼此知心无话不谈者，唯有我和他。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就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美国社会，看到的多是美国社会繁荣和科技水平高，想到的是中国如何学习它的自然科学，从而提高我国的生活水平。绪贻则不然，他用社会学的眼光看美国社会，他认为美国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之高是个果，它背后的原因是它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华盛顿以及华盛顿之后的一些美国杰出总统和精英人物共同建立起来的。他的这种认识比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深入得多。我受他的影响，对美国社会的认识进了一大步。在美国我们两个都学得很好，都有条件留在美国享受优越的生活。但我们两个都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来了。这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顆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心。是赤诚的爱国心又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在两个城市工作，还是常常互通消息。绪贻回国之后在武汉大学任教授。上世纪60年代创建了全国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另一个在南开大学），讲授美国史，并带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美国史学者。同时，他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创建人，对促进和繁荣我国美国史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任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6年，现在仍是中美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他的一生，除早期研究社会学，近6年来着重研究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批判并反对儒学糟粕外，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著述颇丰（请参阅爱思想网站刘绪贻专栏的《刘绪贻著译总目》）。他的著作使国人对美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理解，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他和他许多的美国朋友相互交往，使美国人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绪贻的工作，对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讲到这里，不能不问，绪贻做了这么多这样重要的工作，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不能不想到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绪贻一生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的人格和业绩，说明他深得校训的真谛，说明他是校训的忠实的实践者。同时他又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大学。这所大学有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刚健笃实以及南开的知行合一，合一而成的一种卓越的文化品质。绪贻自然深受这种文化品质的感染，这也是他一生工作的动力。欣逢绪贻口述自传出版之际，特写下上述几行字，作为一个老朋友的祝福。祝绪贻健康长寿，多为人民再作贡献。（叶笃正口述，周家斌整理）注：叶笃正，1916年2月生于天津，1948年11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2003年获得有“国际气象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气象组织奖”，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箫声剑影》

内容概要

《箫声剑影》

作者简介

刘绪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罗家冲，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38年下半年起在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习社会学，1940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在当时国民政府机关任职，1943年末考取自费赴美留学，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副教授，后升教授，是我国早期的社会学家之一。1949年作为进步教授，担任武汉大学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参与了武汉大学的接管。解放后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创建了全国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他著作等身，史论结合，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蜚声世界，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就是与杨生茂共同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被誉为“美国通”。美国总统老布什曾致函感谢他“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所作的努力”。

书籍目录

序言 叶笃正

前言 刘绪贻

第一章 家世

- 一、黄陂县与罗家冲
- 二、我们刘家来自江西
- 三、罗家冲的刘家
- 四、养育我成长的家庭
- 五、16岁前家居环境、家屋结构和家庭生计

第二章 半耕半读的童年

- 一、生而具有的优势地位
- 二、初受学校教育
- 三、么舅妈
- 四、第二次随父读书及其他三次短期就学
- 五、在与时小学的经历
- 六、从非正规教育中学得的一些知识
- 七、藐视权势同情农民

第三章 初中时代：雏燕学飞

- 一、绛帐春风熏我这棵幼苗茁壮成长
- 二、一群益友
- 三、初恋
- 四、爱国活动和我的思想感情

第四章 高中时代：炼狱

- 一、湖北省立高级中学的两种办学方针
- 二、我在省高的学习
- 三、省高校友
- 四、高中毕业后的困境和思想斗争
- 五、开始刻骨铭心的恋爱

第五章 进出南京军需学校

- 一、进入南京军需学校
- 二、前途与爱情的矛盾
- 三、离开军需学校
- 四、准备投考清华大学公费生
- 五、我对清华大学与武汉大学高考试题的比较
- 六、告别周世英上清华

第六章 清华园里：大好年华近于虚度

- 一、对北平的最初印象
- 二、初进清华园
- 三、清华大学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 四、清华大学的培养目标
- 五、1936—1937学年清华园的学生运动
- 六、大好年华近于虚度

第七章 珞珈山上：摸着石头过河

- 一、为了爱情，为了生存
- 二、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借读
- 三、回家过春节
- 四、回到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合大学）复学

第八章 心系国运守寒窗

- 一、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精神与奇迹
 - 二、在蒙自分校继续读外文系
 - 三、转入心仪已久的社会学系
 - 四、毕业论文：《呈贡水利纠纷》
- 第九章 忆西南联合大学师友
- 一、重视实证研究、胸襟开阔的陈达教授
 - 二、博学、济世、宽容、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
 - 三、忆先师吴文藻和师母谢冰心
 - 四、天助自助者——忆费孝通师
- 第十章 忆西南联合大学师友（续）
- 五、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 六、“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冯友兰教授
 - 七、其他名师众生相
 - 八、同窗故事
- 第十一章 陪都岁月：撞“南墙”
- 一、带着遗憾与希望到重庆
 - 二、新婚生活
 - 三、在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
 - 四、在工矿调整处
 - 五、考取留美自费生
- 第十二章 硝烟弥漫闯花旗
- 一、天上掉下来的一点馅饼屑
 - 二、满街神牛八双牙筷
 - 三、见证了下流、偏见、恶意的并不愉快的航程
 - 四、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 五、关于美国的法治
 - 六、短程的朋友
- 第十三章 芝加哥大学的学习与生活
- 一、适应期
 - 二、战胜美国汉学家获硕士学位
 - 三、师友情
 - 四、“发乎情，止乎礼义”
 - 五、震惊世界的学生杀人犯
 - 六、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日子
- 第十四章 留美观感：中美社会、文化之比较
- 一、美国的政治体制有值得参考之处
 - 二、美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那样发达
 - 三、美国人尊重人的自然之性
 - 四、美国人的富贵之道
 - 五、美国的扩张主义

编辑推荐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编辑推荐：如您所见，这是一本口述历史作品，采用口述历史访谈的方式完成。所谓口述历史，按照《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作者唐纳德·里奇先生的话说，就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所谓口述历史访谈，同样按照唐纳德·里奇先生的话说，就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

名人推荐

和“五四”同行

——读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 姜弘（本文发表于《读书》2009年第12期）九十六岁高龄的刘绪贻先生，最近完成了他的口述自传。这本口述自传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讲述了刘先生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而且勾画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写出了这一大转变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追求，以及许多相关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不是小说，却同样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那个时代，并进而领悟百年来中国历史变迁中的某些因果是非。书名“箫声剑影”来自清人龚自珍的诗。龚自珍在多首诗里写到箫和剑，抒发他的“箫剑情怀”；一种既沉郁苍凉又激越昂扬的情感意蕴。刘先生自幼爱读龚自珍的诗文，后来更是仰慕这位爱国的先觉者的思想和人品。既忧国忧民，又愤世嫉俗，这是大转变时代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特征，相距百年而同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刘绪贻和龚自珍，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箫韵幽忧，剑气如虹。在刘先生身上，确有这种看似矛盾的箫剑组合：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潜心学术与直面现实，已经著作等身却依然笔耕不辍，早就蜚声世界却始终只是一位学者、教授，不入庙堂也未涉世场，所获头衔和荣誉，全都是学术性的、民间的。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之说，我认为其中掩藏着一种逃避现实的犬儒主义倾向。正是在这种文化颓风日益蔓延之际，刘先生先后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一九四七年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一九四八年的社会批评文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以及后来的美国历史专著。这都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对现当代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的探索与回答——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放眼世界，要求一方面革除自身的弊陋积习，一方面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吗？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主张也很明确，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呼唤民主、法治。刘先生命名所居为“求索斋”，以上所说的就是他的求索之路，这条路也就是“五四”之路。刘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从一九一九年入塾读书，到今年出版这本自传，中间刚好九十年，与“五四”九十周年同步。这九十年的历史包含了三个时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的旧中国、旧社会；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的“十七年”+“文革”时期；一九七九至二〇一八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一条“之”字形的道路：第一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得到继承发展的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发生蜕变、逆转的时期；第三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艰难回归的时期。刘先生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和这一历史进程同步，也就是和“五四”精神同步。这本《箫声剑影》所记述的，就是他在“五四”新文化哺育下成长求索的经历。读这本书，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更促使我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索和重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五四”的认识问题。刘先生在书里并没有正面谈“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没有谈那以后的学生运动，但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无不与“五四”密切相关，他在那三十年里的成长、成熟和成就，都是在“五四”新文化潮流中浮泳前进而取得的。由此，使我想到了“两个五四”的问题——历史上确实有两个“五四”、“五四运动”。毛泽东和胡适都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五四运动”，指的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上街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群众运动，并以此为界标，区分历史阶段和两种文化的性质。胡适则不同，他认为“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206页）。——二人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都认为有两个“五四运动”，但价值判断刚好相反，一个肯定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政治性的学生运动，而否定那以前的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一个肯定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的政治性学生运动有保留。显然，这是两种“五四观”，代表了两种思潮。“五四”时期属于一个大的时代，即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社会转型，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大变革时代。这一变局是外部挑战引起的，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上述两种思潮，就是应这一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应变之道，救亡之策：一个重在政治——革命造反，一个重在文化思想启蒙。这两种思潮对“五四”的界定和解说大不相同，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一个是文化的“五四”；它们提出的总的口号也不同，一个是“反帝反封建”（即后来的“反美反蒋”），一个是“民主与科学”；二者的目标和途径也大不一样：一个是要通过暴力革命以夺取政权；一个是要通过思想启蒙，促使中国人的觉醒以改造“国民性”。显然，一个旨在打败敌人，一个力求改造自身。长期以来，一般人都把二者混同，虽有所侧重，却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根本区别，更没有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的歧途（也就是鲁迅所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人们只看到表面上所打的“五四”旗号，所发表的赞扬“五四”的言辞，却很少人注意到同一

旗帜和名目之下，竟然有极其不同、相互冲突的两种思想主张，两股思潮。以往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在讲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全都着重谈论爱国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而左翼文艺运动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一股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一种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肯定并改造了这股思潮，使之具有权威性。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各种读物，凡涉及“五四”和鲁迅的，基本上都是对这本小册子里的几段语录的演绎。如今年在八十岁以下的人，大都是受这种教育，从这类读物中了解“五四”运动的。他们读到当时的一些激烈言辞，结合对自身所处荒漠化的文化环境的感受，就自然会把荒漠化的责任推到“五四”先驱者的身上，说他们“激进”，“全面反传统”，“造成了文化断裂”等等。这种误判，主要原因是不知道那个文化的“五四”，更不知道“五四”以后那三十年间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巨大成就。当然，我也注意到了，近年来兴起了一种新的“考据学”——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学校和旧知识分子，如谢泳和傅国涌等所作的，特别是谢泳对西南联大和《观察》的研究。——刘绪贻先生就正是西南联大出身，又是《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把他这本自传与谢泳的研究著作对照阅读，当会相得益彰，更深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些人物。刘先生讲述的，主要是他求学的经历：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然后是中学、大学，直到出国留学归来，这正好是“五四”以后的三十年，新文化运动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当然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不可能是在工农兵中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其活动和成就，首先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和新闻出版事业上，体现在一届又一届、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身上，体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和成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上——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一直到西南联大和《观察》，这中间的全国各级学校和各种出版物，才是新文化思潮和运动的主流主体之所在，应该从这里去辨识其性质和意义，评判其是非功过。刘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这份个人经历实证材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续发展的历史真相。人们也许不曾注意到，今天正在实行的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二年的这种学制，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当年主持其事的，正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这种新学制是对废除科举以后的“学堂”的彻底改造，除采用西方的分段式规定年限外，最重要的是：一废除尊孔读经，二教授新知识，这是“民主与科学”的具体化。这本书里最精彩也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刘先生对西南联合大学那段经历的记述和评说。他提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花了十五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本七百页的西南联大校史：《联大——在战争与革命里的一所中国大学》。这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进行研究。”说到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刘先生概括为十个字：“爱国、民主、科学、艰苦、团结。”照他的解释，后面两项与当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间的合作有关。这实际上是前面三种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关键还是前面的爱国、民主与科学。爱国就是抗日救亡，民主与科学也就是“五四”启蒙精神，这不正是“救亡与启蒙”吗？西南联大的校歌里就有“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很清楚，救亡与启蒙紧密相关。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刘先生列举了那些大师级“人杰”的名单，同时也谈到了另一个方面；联大师生“教书、读书不忘救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在那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中，西南联大有一千多人投笔从戎，走上了战场，有的还为国捐躯，再没有回来。而更其不幸的是，不少人竟因此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坎坷以终。由此可见，民主与科学，才是联大办学精神的根本之所在。说到民主，刘先生谈了三个方面：学术思想自由、学校管理民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贪污、腐败的统治。联大的教学不用统一教材，也没有什么“教学大纲”，而是由教师各自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各种见解，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左、中、右，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达到相当水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在课外演说。但同时也必须听取不同意见，接受问难，进行讨论——这不就是当年蔡元培在北大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吗？关于学校的民主管理，关键在选举，民主选举，而且是在教授中选举，各级领导全部是从教授中选举产生的，没有那种“外行领导内行”的领导。当时联大全校的专职行政人员不足二百人，其地位和待遇都低于教学人员。学生是自己管理自己，有学生自治会，同样是民主选举，更没有专职干部。总之，自主办学，教授治校，思想自由。西南联大办学精神中的“科学”这两个字，是九十年前“五四”先驱者所倡导所坚持的现代人的精神、态度、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这种精神表现为尊重学术、尊重真理。为了学术和真理，西南联大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联大教师一般都不愿做官，而乐于在教学之余从事学术研究。联大师生不论贫富、资历、权位，谁愈有学问，愈掌握真理，谁就愈会受人尊敬，官僚和党棍，在

西南联大难有容身之地。蒋梦麟虽然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他远不如陈寅恪、冯友兰、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等学术大师更受人尊敬。冯友兰先生所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有这样几句话：“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许诺，作一士之谔谔……”这种精神，这种景象，这样的人物，这样的风尚，千真万确的存在过。在国民党统治下专制腐败的旧社会，大学校园确实是民主清廉之地，穷教授、穷学生确实是受人尊敬的群体，因为他们代表着民族的良知、正义和智慧。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的揭露批评，大都来自大学、大学教授，一些政府要员因此而下台。冯友兰的“谔谔”之誉是恰切的。刘先生深情怀念他的老师，重点介绍了七位大师级的教授。他们都是引领青年学子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亦师亦友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那种“温良恭俭让”，fair play，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人类的文明的传承和积淀。刘先生用了六个小节分别介绍的七位教授是：陈达、吴文藻、谢冰心、潘光旦、费孝通、吴宓、冯友兰。我注意到，在这七位大师级人物中，刘先生给予潘光旦先生的赞誉最多也最全面：博学、济世、宽容、风趣。实际上，这四个形容词同样适用于其他几位：说博学，他们都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兼及文理；说济世，他们也都在治学和教学的同时，能直面现实，关心社会并勇于干预时政；说宽容，他们都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民主、平等地处理朋友及师生间的关系。至于风趣，当然是潘先生个人的性格特征、精神风貌。其他人也各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即使是比较严格、刻板的陈达教授，也有他高超的打猎技艺。事实上，这是那个时代的真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精神特征；在当时，平庸、自私、褊狭、乏味的人，是很难融入这一群体的。刘先生的讲述，敬重、宽容之中是非分明。这集中反映在对潘光旦、吴宓的评述中。潘光旦先生真的是古今中外、文法理工无所不知的通才大家。更其重要的是，他的博学于济世高度统一：他一生所从事的多种学科研究，无论是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学，还是教育学、人类学、谱牒学，这一切种种，其目的全在于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进步；而其中中心则是人、人的素质，改善和提高国人的素质。虽然，他的某些观点，比如对妇女问题、婚姻问题、工业化利弊问题的看法，刘先生并不同意；他在一九五九年以后思想改造中表现出的令人惊讶的“左”，刘先生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生平研习儒经太多太久、中毒太深之故，但总的说来、他的为人学，是不能不令人赞佩的，是大体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的。与之相对照，是关于吴宓和冯友兰的勾神摄魄的介绍。刘先生曾受业于吴宓，后来他们又是同事和邻居，但因吴宓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思想保守，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相互间并没有直接交往。但刘先生依然热情地赞扬吴宓在中西文学方面的修养，特别是在教学上的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和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等值得称道的种种。但也同时指出，吴宓身上确实存在不少矛盾和奇特之处，违背常理常情，可以宽容也可以理解乃至同情，却不能像前些年一些论著那样，不加分析的一概称颂。——说到冯友兰，刘先生以冯氏自己的话“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来概括其学术成就，承认他的一家之言，还赞扬他的理论逻辑严密，自成体系，文风朴素流畅，能吸引人。但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认为冯氏的理论过“空”过“旧”，不能救中国，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冯氏的为人多“变”，在以往那样险恶的政治风浪中，能够随波逐流、有惊无险地度过一生，实属不易。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先生的治学持论一如当年，完全符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既尊重对方，又坚持自己的观点，明确表达了他那反对儒学统治的一贯主张。这让我想起了以往曾不断受到批判的伏尔泰的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以我的生命保卫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中，这种符合近现代文明的学术文化生态环境已经形成，当然主要是在大城市和知识界，这是“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先生着重谈的是西南联大，但联大并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存

在，而是一种典型，集中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教育界知识界的状况——在战乱年代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五四”精神，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先秦轴心期的诸子百家之后，有过两个思想文化高峰：魏晋六朝和明清之际。二十世纪前半期的这场新文化运动，应该是第三个这样的思想文化高峰。这三个时期都是“乱世”，又同时都是“盛世”——政治上的乱世，文化上的盛世。战事连绵，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民生艰难。但另一方面，王纲解纽带来了思想解放，文化繁荣，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前两个高峰——魏晋六朝和明清之际，早已有定评且早已成为历史常识，这最后也是最近的一个文化高峰，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逐渐得到承认的。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这段历史，这个高峰。可以说，这是两种传统，《资治通鉴》所代表的是那种胜王败寇、治乱更迭的传统；这里所说的是与之不同的另一种传统，可称之为“改革开放”的传统。前者是政治传统；后者是文化传统。前者所显示的“一治一乱”的“天下大势”，被鲁迅

归结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所寻求的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前一种传统的主角、传承者，是转换中的“王”与“寇”；后一种传统的主角、传承者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如鲁迅所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醒的知识者的任务。”——改朝换代不等于改革。改朝换代是凭借暴力和谋略夺取统治权，改革则不同，是由人的觉醒所引发的对自由的追求。魏晋六朝、明清之际、二十世纪前半期，就都是由觉醒的知识者所发动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这三个时期的知识者都致力于两大任务：对内改革，打破儒家独尊的文化专制主义；对外开放，接纳异邦的思想文化——魏晋的非议孔孟、复活老庄，接纳佛教；明清之际的拒绝空谈心性，倡导经世致用，引进西方历算之学和耶稣教等等；“五四”时期的反对儒学和重视老庄墨释诸家，热情呼唤“德”“赛”二先生，走的是同一条改革开放之路，因而在几十年间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所不同的是，“五四”以后的这个文化高峰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重视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了思想的主流；二是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发展中的现代大城市，形成中的公民社会。有了这样的精神和物质条件，知识分子才从那种“皮毛”关系中脱出，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新的社会群体，承担起引领社会不断改革前进的历史使命。作为个人，他们也才能有那种“谔谔”的胆识和风度。刘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上审视、讲述这一切的，真的是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让人一目了然地看清楚了这一百年中的四股思潮和社会形态——古典资本主义、新型资本主义、极权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变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正是在这四种思潮和力量的影响之下，艰难曲折地走过来的。这本书的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具体谈到了这条路的两端：一端是以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为基本特征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另一端是对内实行民主法治而对外扩张的先进富强的美国。当年那些坚持“五四”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同时也是在上述四种思潮之间，找到这条改革开放之路，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成绩也积累了经验。当然，这一切都是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和干扰才取得的。不幸的是，这些大师级人物和他们的学术成就，在接踵而来的历史大变动中，统统成了被扫荡清除的对象。后来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在“回归五四”“重新启蒙”的呼声中，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续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才逐渐被发现而受到重视。对照当年胡适提出的新文化运动的四项任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弄清楚了“五四”以后三十年里到底都有哪些思想学术成就，那些以“反思”的名义向“五四”发出的无端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刘绪贻先生走过的路是和“五四”同行的，他们那一代人中有的就自称或被称为“五四之子”，如费孝通、殷海光等。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些人，了解这些人的人品和学术成果（而不是名誉地位），让他们知道：真正的“五四”，文化的“五四”在这里。刘先生今年已经进入九十七岁，身体健康，思维敏捷，他要以百岁之身为百年沧桑作证，这实在是难得，也实在令人感动。现在他已经在接着往下写，而且是用电脑写。我们等待着，等着看这本书的续篇，看他在以后的地覆天翻历史巨变中，是怎样走过来的。

精彩短评

- 1、刘绪贻，社会学家，负笈西南联大时师从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留美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这本回忆录的出世，让人们看到，武汉大学让当代人肃然起敬的资本，在校长刘道玉之外，尚有这么一位联大老校友。
同为西南联大校友，何兆武的《上学记》让我鼓盆而歌，但是续集《上班记》，何兆武却是说自己百年后再出。《箫声剑影》由老人口述，经人整理，尚未涉及回国后的经历，实质是上卷，我翘首以盼等待下卷，不知道他会如何描述人生的一叶飘萍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中起伏。
- 2、由于是口述自传，文中语言并非大师之笔，明显感觉语言过于平淡，用词也不够丰富，惟有最后一章读来痛快。作者生平经历，尽管也是和普通人一样，确实比较丰富多彩，历尽坎坷，所见所闻都代表了整个时代。书中关于政治观点，作者总有些掣肘，难以直抒胸臆。
- 3、可读性并不是很强，但是可以了解民国时学人的一些情况。老先生说话还是挺坦诚的。
- 4、有名的社会学家刘绪贻的口述自传，此书写得真的很好，很真实的反映了刘绪贻的一生，求学、爱情、学术之路，一路走来，主人公真的很不容易！一直喜欢看名人自传的我，觉得此书确实是本值得看的书！给人很大的人生启发！
- 5、之前刚出版的时候就已经买到这本书的毛边书，这次看到活动中有这本参加活动，就再买一本留着慢慢翻阅吧。
- 6、书品相很差。。。郁闷。。
- 7、文化老人，值得一看。
- 8、读的时候总不免想起《上学记》，比之端正严密，却也少了某种震荡与勉励人的激情，又或者回首百年，即便当时心有戚戚，细细述出，不惘然也多是平静。与《上》一样，西南联大部分读来让人倍感羡慕与珍贵。（此外，我突然想重读茨威格）
- 9、很多细节，写得很好，再现了当时社会面貌
- 10、3元买的，哈哈
- 11、看着刘老的平实的叙述，会让人在无奈于当今的教育、人文环境，羡慕那段历史的同时，有些力量坚定自己内心的原则。
- 12、神马时候可以见见刘教授啊。。。
- 13、感觉到作者在应付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 14、20110529今日购书。
- 15、口述历史近来颇有大有其道的势头，无奈佳作叠出之时亦难免泥沙俱下……较之同类其他著作而言，本书稍显平庸，予人避重就轻之感，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今日看来如此平淡，传主之咎欤？抑或整理者未尽其责？
- 16、还不错哦，性价比很高，印刷很好
- 17、自由，只有失去才觉珍贵。感谢晓悦姐
- 18、不错，可惜第二集等了很久了，都没见出版。。。
- 19、尽管取名为“箫声剑影”，但是江湖气似乎还是不够浓很平淡。西南联大之前的家世部分稍显冗长，西南联大部分和“上学记”相比逊色很多，感觉作者的顾忌还是很多，总有没有说透的感觉，不像个百岁老人百无禁忌的痛快。不过里面提到的一个人物是我近几年看到评价最中肯的，关于吴宓的部分是最精彩的。作者显然还有计划要写第二部分，写痛快点，写快点。
- 20、总的来说流水账，只求面面俱到，却实在欠点文采。但阅历多的人就算是扯闲篇，也应该有些看头。
不过翻了翻，感觉政治化严重，不像老实话。不知被洗脑过甚抑或真的思想单纯！大概还是老学究美化自己的企图居多吧。
- 21、喜欢第九第十章回忆西南联大的师友和最后一章比较中美社会、文化~~不过刘老对于儒、道、佛的贬斥和部分观点不能苟同~~
- 22、终于赶上了满200返100，太合适了！这单平均下来太超值了！爽！
就是挑的有点辛苦，好书不多
- 23、感觉刘的脑子被洗过了。许多话，他说出来，不是糊涂，就是昧心。

《箫声剑影》

- 24、怎么说也是吃过洋面包的老人了，其中有些有趣的东西，但是文字确实不够丰满。
- 25、箫声剑影（一）：刘绪贻口述自传”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
- 26、这书是跟《凡尘俗事》一个订单来的。那是本烂书，这本书正好是它的补偿。多说无益，还是你自己看的好！
- 27、好书啊！看到了很多没有看到的東西，如此总结一个世纪的历史，记录那些亲历的事实，我们看到了小叙事！微观里的宏观！
- 28、等下卷
- 29、西南联大
- 30、功课
- 31、买来学习学习~
- 32、说不好什么原因，现在对这类书有种抵触感
- 33、本口述自传，访谈者做了充分的准备，较为严谨细致。刘老的口述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百年之后再来看，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一直期待下卷出版，如此，方称合璧。
- 34、把吴宓扒光了
- 35、真诚！
- 36、个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刘绪贻的这本口述历史比何兆武的《上学记》更耐读。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
- 37、简体字版
- 38、不同时代不同人生
- 39、比想象的要好得很
- 40、价格优惠,很好的书。
- 41、这些老头，一个一个的谢幕了，真让人遗憾的紧朴素真实的一段历史，读起来让人充实
- 42、老师的老师，当然要顶
- 43、最真诚的回忆录.
- 44、继《上学记》和《读史阅世六十年》后的又一本西南联大人的回忆录。钟情于有关49年前大学特别西南联大的回忆。
- 45、本书是留在大陆的民国学人很难得的口述史大作。根据豆瓣书友反馈：广师大出的这个大陆版基本保存了原书全貌，似乎只在第一章和第十四章这两个关键部分做了些处理。对此，刘教授也无可奈何，毕竟国家大环境如此。并且此书未提及49后的历史，但是有港版，希望有朝一日后续能出足本！
- 46、内容详实，颇有启迪！

1、朱文轶记录历史剖面的纪实随笔《进城：1949》，时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刘绪贻先生，成为他笔下一个经历了两个时代的知识人典型，于是“城市和人”这永恒的母题，都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表现出值得琢磨的一面，那种知识分子在社会巨变之中的惶惑和困境给人印象很深。《箫声剑影》这本书即是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按照规范的口述采集整理而成。其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刘绪贻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看得出，对于这样一个身份，老先生并不特别在意，而更注意自己是清华的学生。这一点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或许就是西南联大的特殊之处，它是在特殊时期组成的特殊的高等学府。联大三校复原之后许多年，联大教授和校友风流云散，有的人已经隐入历史，但其思想和生平时不时被后人的研究重新挖掘，无法寂寞；有的人安安静静活在民间，不为人知，后来并没有在学界闻名；有的人像何兆武先生那样，研究的成就已经广为世人所熟知，但他联大校友的身份如果不是《上学记》的出版或许永远不会被人注意。当时代的变革来临，早年没有留学海外的联大校友多数选择了留在大陆，他们注定成为过渡时期的知识人，随着时代而变化，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历程注定散发着“典型文本”的气息，为后世留下历史研究的珍贵注脚。刘绪贻先生这本口述自传，就具有这样的意义。早年求学，历经辛苦，成为清华公费生，遭遇民族生死危亡，远赴西南艰难攻读，抗战胜利回到重庆后又在政府机关里苦熬岁月，得到“天上掉下来的一点馅饼屑”，赴美留学，学成归国不久中国就进入了现代史，在大学任教后又发现自己的专业学科已经不复存在。时代所赋予的，灾难也好，机遇也好，不容拒绝，在个人身上的投影却各不相同。1938年8月联大蒙自分校迁回昆明校本部，刘绪贻终于顺利转入心仪已久的社会学系。那时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正在吴文藻先生的主持下处于“中国化”的进程中，第一代本土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正在经由“体质人类学”向“社会人类学”的破茧成蝶。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燕京大学是国内为数不多开设社会学系的大学，当时所用教材全是西方原版，授课教师一般为西方人或者回国留学生，用英语讲授。社会学系的学生学习了之后根本无助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和产生规律性的认识。社会学无助于国计民生，是吴文藻这样的怀有“教育救国”理想的早期一代留学归来的社会学者所不能接受的。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呢？吴文藻先生他们的作为是即刻开始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田野作业，亲历实地调查研究。以笔者的认识就是，这个研究方向也就是尽快取得中国当时本土的、真实的社会学研究样本，并且根据这些样本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且这个结论要对中国其它地区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样的成果就是后来《江村经济》等一批著作的问世。刘绪贻先生口述自传中的潘光旦，笔者私意认为是他对联大师友回忆中写的最好的。因为这一段的回忆不单单是罗列史料，对潘光旦先生当年一些主要学术观点，在多少年之后，刘绪贻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众所周知，潘光旦先生当年最受争议的观点无疑是女性社会地位问题和婚姻问题。因为他的观点是基于男女性的生理分化和优生学，由此认为女性在对子女的孕育、营养、早期教育的责任明显要多于男性；反之，不顾男女身心上的显著差别，一味追求男女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强迫女性像男性一样胜任所有工作和社会分工，就丧失了女性的天赋之权利，即失去了做女人的权利。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潘先生无疑是女权运动的反对者，必然要接受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另外，潘先生对当时的婚姻问题的看法也很有趣，他认为新式婚姻主张恋爱绝对自由，绝对没有条件，由个人独断，别人没有任何决定权，——依照这种原则形成的婚姻，并不比旧式婚姻的好合程度更高。因为自由恋爱很显然存在着太大的主观成分，与其承认这种主观，不如相信婚姻背后的客观条件（这个“客观条件”实际指的就是门当户对）。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来看，这样的婚姻观点显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并非没有道理。刘绪贻先生批评这种观点的主要衡量尺度——稳固和幸福，恰恰是潘光旦当年的思考基础。即：没有选择可能有无奈的稳固，单纯追求幸福则往往会盲目，频繁的推翻眼前的婚姻，去奔向相对的“更幸福”。刘先生对潘光旦的批评具有49年之后知识人思想接受洗礼的鲜明特征，而稳固和幸福，仍然是今天人们探讨婚姻命题时扑面而来的无解之谜。刘先生是在抗战的弥漫硝烟之中开始他的留学历程的，一个新世界在眼前展开，以及在国内经历目睹了那个专制、落后的中国，这或许使刘绪贻成为最早开始观察美国社会，了解“古典资本主义”的特征及其在美国的实践，思考中美思想、政治文化差异根源的那一批近代中国学人之一。这一点从他比较美国政体的参照物就能看出来。国民政府的运行情况及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给曾经做过政府公务人员的刘绪贻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对于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当时的情况，他在回忆中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产生巨大落差两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美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注重“手和脑”的并用，即他们在接受教育时注重实践和实证，而中国知识阶层传统的意识是摆脱手工作业越远，越能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成为做学问成功的标志。另外一点是两国的知识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美国人认为自己面对世间万物和宇宙苍生，最后可以得到解答的地方很少，只能找到一个极其微观的点去研究，获取新知；传统中国知识人也承认自己对世界认识的局限，却不甘于此，在心中想象出一个失真的世界来，以为这样一来就从宏观上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理学中的“格物”虽然有部分体察万物的思想，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践也很少有实证和实验的例子，还是离不开对世界的假想和主观上的“占领”。就其后一点来说，等于说是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经典哲学观点给与了很大的否定，具有一个时代沐浴西方文明之风后的中国知识人的思考特点。虽然时隔多年，再来看待这番总结，还是能使人看到我们社会形态方面很深刻的内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走向的起承转合中，有太多的事实可以佐证刘绪贻的看法。他当年对美国的观察和思考现在由林达们接棒，或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2010-5-5

2、最近如饥似渴的读完此书，这是一个百岁老人，社会学前辈对往事的回眸与思考。很坦率也很直白。他的直率，可以从对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和不少的女子暧昧的关系的直白叙述可以看出，他并不因为自己青年时代的风流而避讳。那时的他，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小孩，但是一个人身在异乡，寂寞难耐，因而就和许多异国女子发生了几段情感纠结。书中，有对往事的回忆，也有对师友的怀恋，更是对自己一生做一个梳理。虽是口述史但是可以看出回忆着本人的心血，很多篇章如关于西南联大诸师友的会议一看就知道是回忆者亲自操刀。书中重点部分就是作者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特别是转入社会学系后的难忘经历。那时的社会学，人才云集，激情四射，如纵贯古今，学通东西、特立独行的潘光旦，严谨的陈达，刻板的李景汉，痴迷于书的吴文藻，青年才俊费孝通。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有这样一群，他们人心怀救国梦想，痴迷于学术，积极践行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者因为私人的原因虽然在这个学术团队中坚持下去，但是他在几十年后，仍然深情回忆，恋恋不忘，为脱离这个学术团队而后悔。而后，他终于还是去了社会学的重镇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留学，亲自感受了帕克、雷德菲尔，奥格尔等社会学大家的风采。等他学成归国不久，社会学却惨遭厄运，前辈学人命运各异，那个激情燃烧，大师辈出的年代终成绝响。

3、还是有不少有意思的东西的，毕竟是展现了一个个时代的风貌。不过总体风格显得沉闷，显然叙述者不是个特别能侃的人。总体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几处是讲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真的让人觉得像求学天堂，而且因为有奖学金，这样的求学天堂也不是只设置给有钱人的。现在美国的大学，都没有那么好的环境和气氛。另外讲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那部分也很有意思。以前看的大部分西南联大文章都是讲昆明的。作者对自己见到过交往过的一代学者的评价，我觉得也是很诚实中肯，有理有据的。但是总体上还是觉得这本书有点闷。大概按我的标准，刘老先生是比较无趣的人，成长轨迹也比较凤凰男。另外我觉得有点惊讶的是，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太太在国内，然后他就大模大样地和若干女同学约会恋爱。按说我也不是很封建的人，不是说看到男女社交就大惊小怪，可是他真的是在约会谈恋爱啊。而且比较奇葩的是，他还不是偷腥，好像就是觉得太太不在身边自己随便谈谈恋爱蛮正常的...比起来，刘先生同辈人何兆武的《上学记》我觉得是有神采多了，好看多了。不过这是各人性格差异，不可强求。这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

4、《箫声剑影》：刘绪贻的忧患人生刘绪贻，社会学家，负笈西南联大时师从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留美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这本回忆录的出世，让人们看到，武汉大学让当代人肃然起敬的资本，在校长刘道玉之外，尚有这么一位联大老校友。11至12岁期间的刘绪贻，在父亲的影响下接触到了《饮冰室文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书，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的思想，让正处于阅读启蒙阶段的刘绪贻获益不可估量。西方东渐，新旧交融贯通，正是那一代人的亲历，也是机遇。刘绪贻对清华园的温情回忆，前人沉湎，后人追望，时值1936年，是中日关系剑拔弩张的时段，也是民国政府黄金十年建设的阶段。清华园得益自庚子赔款，财力丰厚，硬件设施之高档在国内大学屈指可数。如刘绪贻记得，“每间寝室住两人，各有一床、一套桌椅、一书架、一衣柜。”“为防风沙，窗子有5层：最外层位竹帘，其次为百叶窗，再次为玻璃窗，玻璃窗上附一层白绸布，最里面是一层淡色厚布帘。”衣服每晚有专人洗涤和熨烫，一早送回。食堂伙食物美价廉，还有西餐馆，电话叫外卖，如此养尊处优、如此现代化的大学生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出现了，这跟上海西化中式兼备的旧日繁华一样，只能让后人叹风云变幻世事无常。刘绪贻记忆深处的西南联大，是佐证、补充史料的不可多得之处。国难当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吃穿到学业，都是因陋就简，无论学生还是教授们。梅贻琦家常吃不起蔬菜，梅夫人摆地摊、制造打糕、打毛线和围巾出售以补贴家用；闻一多替人刻章，兼职中学教师。这些证明生活之苦，让体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放下矜持去挣外快补贴家用例子，在其他人的回忆录里也比比皆是。吴宓觉得昆

明一家牛肉店取名“潇湘馆”，认为辱没了林黛玉，而提着拐杖去砸招牌。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分分合合，反复多变，吴宓敢在毛彦文面前谈自己与其他女人的感情，甚至对已离婚的前妻陈心一搞巫术，“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诅咒其人速死”。“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吴宓的感情生活就如不谙世事的顽童，围观者直觉其可爱率真，局中人深受无法原谅的伤害，33岁的毛彦文最终出嫁66岁的熊希龄。联大的追忆，因为多面而鲜活，有许渊冲的自傲，有汪曾祺的诗情画意，有鹿桥的纯洁烂漫，也有《联大八年》里的救亡图存心情的焦灼。1943年，他取得自费留美学生资格，专业社会学，而经费的筹集，居然是托关系将身份改成湖北省公费生，由省政府资助了大部分费用。到美国之后，清华的本科生对接美国的硕士学位，在专业衔接上轻而易举过渡，唯有英语听说能力需要磨合。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准，已经位居国际前列。留学美国的刘绪贻，一生的思想却是偏于左倾，尽管他与人一起编著六卷本的《美国通史》，被誉为“美国通”。生平回忆中俯拾皆是他的思想观念流露。1942年，刘绪贻得大女儿，取名刘东，按照他的意愿，取名有“杀东洋人”的意思，由此可见化不开的民族国家意识。刘绪贻还提到了清华园时期，“右派学生何柄棣打了左派女同学黄绍湘”，此事可与何柄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相参照。刘说在清华园期间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同情左翼学生，思想上自认是一个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而屡屡自信因为爱情的相思导致年华虚度，因而感到烦恼，这种少年歌德似的烦恼，再置于国难家境的苦愁大背景下，自遣不已。救亡与启蒙，这是一个争执已久的现象，但尽管刘绪贻的个人情绪中有革命之心，但现实中的他还是忠于学术，埋首象牙塔，终获大成。刘对《独立评论》追叙时，说当初的热衷阅读，并不知道其创刊有与蒋政权结合之意。他对多元化的美国评价既是天堂，也是地狱。他对守旧的学者，皆有不平和揶揄，甚至认为“吴宓这样死心塌地地地殉一种过时的对国计民生无益而有害之道”。他一生对民国政治深感厌恶，但是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却也唯有在那个时代和社会中才会获得如此人性化的裨益，而今西南联大成广陵散，充满人情味和人文气质的官员也罕见人影。看看许倬云是怎么说的：“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五十岁我才理解，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五十岁以后，我理解到人间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同为西南联大校友，何兆武的《上学记》让我鼓盆而歌，但是续集《上班记》，何兆武却是说自己百年后再出。《箫声剑影》由老人口述，经人整理，尚未涉及回国后的经历，实质是上卷，我翘首以盼等待下卷，不知道他会如何描述人生的一叶飘萍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中起伏。成稿于10-07-18

5、一点都不虚伪。超级喜欢作者这一点。对于自己的感情，一丝不遗的描述。我曾经以为那少年的心动，成人的暧昧，都是不可言述的，都是不能言述的。原来世人皆如此啊。大胆的爱。如他一般。只要你真实。

6、这座城市贡献的一颗中国良心 刘洪波《长江日报》5月29日“长江评论”这座城市贡献的一颗中国良心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这个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件事情要放在“城市观察”的专栏里面来说，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个贡献。刘绪贻先生以美国史研究而著名，长期供职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今年已经97岁了，身体健朗，笔耕不辍。以我的年龄，自然无法完全体味一个世纪老人的感怀；以我的学识，更加无法对刘绪贻先生的学术贡献进行评价。然而，即使完全忽略先生的年龄，即使对先生的专业研究缺乏了解，仅仅从一个知识人的角度，我也能够感受他生活的坦诚、思考的激情与表达的勇气。《箫声剑影》这部回忆录，我读的是先期印行的海外版。书里有先生对家人、亲友以及包括西南联大诸多老师同学在内的人物直言不讳的讲述，无论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的人物，都给以真诚的注视和直率的评说。这部书里更有先生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解剖。对别人的事情和盘托出，对自己的人生和盘托出难。刘先生在口述自传中，对自己的一切无所避讳，对自己的解剖与反省甚至苛刻。卢梭的《忏悔录》传之久远，是因为其真诚；先生这部回忆录，具有同样的品格。我不知道如果有幸像先生一样长寿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只知道现在我无法做到这一点。仅此，先生是我仰望的人，这与学问无关，只与做人达到的境界有关。我与先生的交往不算多。虽然先生是我母校的老师，但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长江日报》工作，才在一次报纸开办国际评论的座谈会上见到先生。先生说，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些必然是共通的，不能说你不熟悉或者嫌麻烦就不搞，例如对权力进行制衡。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与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也有几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是请他写稿。这些年里，先生一方面完成《美国通史》的鸿篇巨制，一方面对民命国瘼深为关切。虽然身在书斋，但先生绝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乐于以一个公共知识人的身

份致力于社会进步。先生跨越了一个巨变的世纪。这个巨变的世纪，对一个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的展开，是不幸还是大幸，真是难以判断；但对一个以社会学与历史学专业的公共知识人来说，无疑提供了触及灵肉的社会与历史思考背景。先生的思想和评论文章，其历史反思的深度、触及现实的锐度、文化批判的力度，经常令我拍案叫好，畅意何如。如果不知道先生，很难相信那些文章，作者是一位年近百岁有过多般曲折的老人。先生也偶然给我赐稿，引为遗憾的是，我并不是总能使他的文章见报，虽然他论说有力而且逻辑严密。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学芝加哥大学，回国后任教于武大。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近年被译为中文出版。既得利益对社会变革的抵制，这是历史研究，应该也是先生百年人生亲见的实景。先生自青年时代至今，学术必以有助于现实，学术之外始终乐于公共发言，大概正是以社会进步为毕生所期。无须讲先生如何德高望重，先生在武大的存在，在武汉的存在，在中国的存在，是我们的福分。先生是这座城市的一道人文景致，更是这座城市贡献的一颗中国良心。

7、记得学期中的一天，在物美地下的书店中看到了此书，等到学期的种种事情忙完，才从图书馆借来一阅。回家闲来无事，数日就读完了此书。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喜欢读近代学人的传记，而刘先生这一代的学人的传记也读过不少，诸如季老、杨绛先生、何兆武先生以及何炳棣先生等等。刘先生的自传虽然只写道解放之前，但还是反映了那一代中国学人的经历——动荡的年代诸事不易，无论是生活还是求学。虽然相比于陈寅恪先生这一辈而言，作为青年的他们此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但是时代对于个人成长所设定的背景在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厚的印记。或许在后来者中，我们出生于50年代的师长有着最为相似的磨难经历。不过细究两代人之间，无论是在知识背景还是为人处世之道方面，差异不可谓不小。而我们这群生活在“繁荣”年代的年轻人虽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但相比较而言，层次却也低了不少。一个时代总有渐渐远去的那一天，刘先生这一代的学人也渐渐的离我们而去。因此，当在燕园中不时的看到坐在轮椅上的百岁老人侯仁之先生时，心中总是不由得生出一丝敬意。当然，与我个人而言，阅读此书也有怀念先人之情夹杂在其中。一个月前，即将九十岁的外公离开了人世。虽然外公走的很平静，但我总还有些遗憾，因为我曾经萌生过为外公作口述自传的想法，可惜由于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以及自己的慵懒，此想法从未说出过。虽然在为外公撰写追悼词的时候零散的写了一些，但这计划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不过好在外公留下了不少的诗文，能够让我们晚辈记住先人不易的一生。因此，在读刘先生的自传时心中总是带着些许的遗憾。同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一样，这也是一本没有尚未写完的自传，期待刘老能够继续写下去，为我们写出一个中国的百岁知识分子在这一个时期的光荣、梦想和苦难。

8、武大正门不远处有家豆瓣书店，店面很小，跟我住的四人间宿舍差不多。近三年时间里，我在那里买了很多半价书，有几本还是已经被禁的。这本香港出版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是老教授托书店卖的，我有幸购得一本。在一群党棍领导下，武大这几年明显是走下坡路了：负面消息不断、后勤服务稀烂，连一直坚定留守的邓晓芒教授也不堪束缚，去了附近的华科。高楼倒是一幢幢地建，富丽堂皇；樱花节期间还是人满为患，一天几万的游客每人掏十块钱买张门票进来，大声喧哗，把垃圾扔得到处都是。只有每天绕着狮子山后的路回宿舍，仰头看到狮子山顶苍翠掩映下的老图书馆时，我才觉得这所大学是值得留恋的。我喜欢武大的老校训：明诚弘毅，而不是现在那个俗不可耐的八字纲领。我喜欢椭圆形的老校徽，仅仅是简单的“武大”两字，却有说不出的古朴典雅。一位已成为作家的老校友告诉我，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作家班的同学经常整晚绕着珞珈山转，聊天，一直到天亮，而我现在的同学，只愿意整晚在寝室里，打游戏通宵。

“武汉大学校园有山有水，花草树木茂盛，十分美丽。”虽然1937年只在武大借读了几个月，但这句话似乎为他日后回来任教埋下了伏笔。他清晰地记得当年“珞珈三剑客”之一的袁昌英教授（另外两位是凌淑华、苏雪林）为他上的每一门课，董必武和周恩来做的爱国救亡演讲，以及那位全校闻名的美人叶琼悲寂落寞的一生。更多的记忆是关于西南联大的，这一部分，原始稿为15000字，做后定稿居然扩充为53100字。在这所中国条件最恶劣，成果最丰硕的大学里，学术及其自由，真理最受尊重。教师不用统一教材，而是在课堂上阐发各自的学术见解，教师之间为学术问题激烈争论，却不影响友情；学生在课内课外都可以提问，也可以与老师争辩。无论是谁，只要有学问，就受尊重，官僚和党棍则难有容身之地。梅贻琦校长一家，穷得每餐只能吃辣椒拌饭，能喝到菠菜豆腐汤就很满足。梅夫人做糕点、打毛线衣、摆地摊补贴家用。但是教育部发给西南联大学生的补助金，他却从来不让自己在联大读书的4个子女申请。呜呼，读至此唯有长叹而已！现在那些从不关心学术，尊重学者，对各级领导却极尽溜须拍马，只求自己升官发财的大学校长，何如哉？

此书学术价值最高的有两处。第一章开始是这样概括上世纪整段历史的：“就世界而言，20世纪是人类应付古典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时代。”这是非常精准的概括。

为应付古典资本主义社会带给人的灾难，人类创造了四种主要的社会模式：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社会。他详述了四种模式的具体情况，权衡利弊，虽未施褒贬，读者却不难看出他心仪哪种。还有就是十四章中美社会、文化之比较。美国科学为何发达于中国的分析最为精彩：美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把宇宙分成很细的部分，个人竭尽全力，了解这一小部分，长年累月，整个宇宙也许有了解的一天。而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则总不甘心于承认自己的渺小，总想从全体把握宇宙，给自己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宇宙，便以为是“顿悟”了。

所以，虽然中国人一向提倡谦虚：“满招损，谦受益”，但这种谦虚仅限于人伦领域。也许是由于自古缺少超越式宗教，面对着浩瀚的宇宙，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谦卑之心。

现在这本回忆录只出了上卷，下卷的工作已开始，我已在书店预订了一本，迫不及待想读到。下卷是建国后的经历，不知他会怎么描述反右、文革、改革开放、six-four，以及武大学生最感兴趣的刘道玉老校长？希望刘教授和刘校长都能长寿，希望有一天这部回忆录能一字不删地在大陆出版。这一天，我能看到吗？

拜访刘绪贻 在武大附近的小书店买到香港出版的《箫声剑影（上）》，并花了一天半时间看完后，我在豆瓣网上写了一篇书评《珞珈山下的记忆》，结果居然被老先生读到了。第二天，他托一位学姐——我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刘教授自传下卷的整理者——给我发了一短笺：“读了你写的对拙著的评论，很是感谢。看来我们的思想有些相似。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约个时间聊一聊。”

刘教授家在草木繁盛珞珈山上。翌日，我清晨从工学部出发，绕过半个樱花刚谢的狮子山，再穿过哲学学院旁边幽暗的防空洞，往左拐，一栋栋地找过去，才在种满樟树的北三区最靠上的位置，找到了他的住所。刘教授亲自为我开门，虽然已97岁，但看来腿脚还不错。带我进了书房后，他就要为我泡茶，岂敢岂敢，老先生比我大76岁！我赶紧接过他手中的茶盏，在饮水机下给自己接了杯白开水。因为听力不太好，交谈时，我要凑近他的耳边大声地说，就好像现在我们不是在一位学者静谧的书房里，两边是白色的封闭式书柜，窗外是早春柔和的阳光，而是在一个嘈杂的施工工地上。

书架上摆满了中英文书籍和资料，有些是他的学生送的。其中一位的著作摆在靠书房门口处，特别显眼。这位学生二十年前因为政治原因无人敢收，这时候，刘教授顶住压力，把他招入门下。他苦读十年，留校任教，后来成了研究西方文化的著名学者，他的名字叫赵林。只看学术水平，不论政治立场。这本应该是社会评价一位学者的正常标准，在今天却成了奢求。我在这位老先生身上依稀看到了西南联大的风骨，与现在书斋外面的世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就在五天前，我竟还不知道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教授。由于学术观点不合主流意识形态，他受尽打压。每个有着独立精神的人在现实中都是处于弱势的。他的影响被人想尽办法地减少，做得相当成功。本来在从未摆脱专制阴影的中国，要扼杀一个人的思想就很简单，像拿一块布把黑板上的粉笔字抹掉。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是在十多年前。那一次，讲座主持人说了一句过激的话，被勒令公开道歉，但是她回答：“就算把我开除，我也不道歉！”直到今天，提起此事，老教授还是无奈地摇头。

赴美留学前，刘教授还是个无党派分子。在芝加哥大学受到一位左派犹太同学影响，他信仰了共产主义，回国后就加入了地下党，并在储安平《观察》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当后来储安平提出要为他编一本文集，他没有答应，因为身份不能暴露。然而这段革命岁月在后来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庇护作用。文革结束后，虽然名义上是党员，但他基本游离于组织之外——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后，在剩下的岁月里，他只想潜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想再过问政治。

当和我谈起起浩劫期间失散的文件——包括与储安平这些友人的——时，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悲戚。如果今天还在，这些东西肯定已是无价的财富。它们就像从岁月这棵大树上纷纷飘下的叶子，不知道被风吹到了哪里。新文化运动那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对儒学没什么好感。就连写文言文、生活作风传统的吴虞，也坚定地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作为他们的一员，刘教授认为，儒学在中国还没被完全批判彻底反思时，人们就已将矛头转向了资本主义。结果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儒学的负面沉渣泛起——比如个人专权擅权现象，论资排辈的“官本位”现象，跑官要官的吏治腐败现象，拉帮结派的宗派现象等等——虽然已年老体衰，他仍要大声疾呼，提醒人们警惕这一点。

走之前，刘教授送给我一本书，是他半个多世纪前写的硕士论文，后来在武大，被他的学生们翻译成中文：《中国的儒学统治》。他要在这本书上为我题字，拿起一支笔，有点吃力地写下有些歪斜的十几个字，每写一画就发出沉重的呼吸声：

“赠***同学刘绪贻2010年4月4日”。

——附：广师大出的这个大陆版基本保存了原书全貌，似乎只在第一章和第十四章这两个关键部分做了些处理。对此，刘教授也无可奈何，毕竟国家大环境如此。

9、 原载《文景》杂志2010年7、8月号合刊 一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口述史近年来已成为书界偏爱的选题，其实这类图书要获得成功并不容易操作。口述是互动的过程，需要口述者与采访者共同完成。相应的，对这两方面都有要求。从传主而言，口述史“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领袖人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点及面，窥知历史变迁的若干因果，此不待言；而“默默无闻的人们”身上则积蓄了大量来自民间和底层的信息，可补充大历史的残缺，甚至对公认的历史神话予以颠覆。本书传主刘绪贻似介于二者之间，刘先生不入庙堂，所获头衔和荣誉，全都来自学术与民间；但又当然不是“默默无闻”：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两年后在西南联大从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习社会学，1943年末赴美留学，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教武汉大学，解放后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著作等身，尤以主编六卷本《美国通史》蜚声学界、影响深远。这是典型的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由其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确能勾画出时代风云与历史人物精神风貌的重要面向。但与“身份”相比可能更重要的是，口述史所选择的传主还需具备一定“特质”，比如思路清晰，既不能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又最好能坦诚相告、和盘托出。刘先生“记忆超人，九十年前学诵的诗文随口就能背诵”，每次口述之前都按照预先拟就的细目详加准备，为查找一个交往日期而翻遍数年日记（参见本书“后记”），这应该是史家专业习惯使然。而从“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章内容来看，可能确实做到了“敞开心扉”。就采访者而言更是要求严格，口述史的“田野工作要想获得成功，就需要在与被访者的互动过程中掌握人际技巧和社会技巧，同时也需要掌握专业知识。……口述史课题需要一系列技巧，这些技巧不是由那些更有经验的人、专家或写作好手独占的，它可以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提供合作。口述史课题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智力，而且有时也能够通过走进他人的生活发现深层的、活生生的人类经验”（《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优秀的口述史作品往往根据口述者的录音材料，再综合多种史料，续以考辨、注解等工作，这本身已是一种历史研究。以前唐德刚先生风靡一时的《胡适口述自传》即属此类（考订周详且往往以美文出之，我尤爱读其中与胡适“抬杠”的文字），近年让人寓目难忘的则可举出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而本书的采访者亦步武贤者、取法乎上，力求“通过走进他人的生活发现深层的、活生生的人类经验”。 第一章叙家世，开篇倒从“大势”谈起。“20世纪是人类应付古典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时代”，为了克服危机，人类创造了许多新的社会模式，这些模式的实践、演进造就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和国家形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近百年来我的生活和工作，思想和感情，当然是会受到上述世界格局和国家形势的影响甚至制约的。因此，如我的口述自传合作者余坦坦所说，口述我的自传多少能反映20世纪的时代脉搏；要是能多多少少暗示21世纪人类和我们国家应该和可能走的道路，那就更是我求之不得的”。这自然出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专业“怀抱”。 二 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所呈现的“多歧性”，今日已成为近代史学者的“共识”。此书提供的不少材料呈现出“中心”与“边缘”的互异与沟通。刘绪贻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塔尔乡罗家冲，在刘印象中，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跟我们罗家冲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影响很小，村子里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一种状态”。不过其中竟然也有新潮接受的种子，“1905年废科举后，我的父亲进过新式的黄陂县望鲁高等小学（当时小学是低级学校的意思，招收成年人）……他曾以赞赏的心情向我提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以及《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书”。废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此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正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群体。科举制的废除断绝了如刘氏父亲这般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他也无法在新教育体制下跨入知识精英的行列（新学堂起初不乏“成年人”，但以后入学年龄则限制得越来越小），由此造就大量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今日研究者从社会史的分析得出，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而非“引车卖浆者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读者和最有力支持者。从刘绪贻父亲的经历来看，他并未适逢其会由参加新文化运动而从“边缘”走向“中心”，由此改变自身命运；但他对新潮确是倾心接受：“赞成写白话文，不反对打倒孔家店，在家里实行天足运动，不包办儿女婚姻”，更可贵的是，他教书时，选择办学方针和一般私塾不同，不教“四书五经”一类旧书，“课程设置是按照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门关于小学课程的规定确定的”……边缘知识分子有不少“过渡”和“中间”特

征，其身心徘徊在城乡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联系、沟通精英与大众的功用（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父亲的趋新不是普遍情形，大约1920年，他“离开黄陂以后，我就回到罗家冲，在老二房的叔祖父刘玉堂办的私塾里就读”，这时读的就是《百家姓》、《千家诗》、“四书”这类。本书中保留了不少刘先生的酬唱诗作，可见其幼时打下的旧学功底。从教育经历来看，刘氏身上有很深的中西、新旧杂糅的痕迹。傅斯年曾对胡适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而向来被目为最西化、最趋新的胡适也坦承自己一身有“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者并存。1913年生人的刘绪贻身上也不免此二者并存，他的自剖是：“初中时，我的思想情感的主导方面虽然日益受到‘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倾向科学和民主，……而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又使我拖着一条清末社会读书人的小尾巴。有时我喜欢与自然和谐相处，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有些敏感，埋怨其破坏自然；有时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互相同情、互相帮助，既不要斗争，甚至也不要竞争，真正做到‘四海之内，胜于兄弟也’；有时我不免羡慕旧社会读书人才子佳人式的生活，或者红袖添香夜读书，或者穿一件绸长袍，走在田间，风吹长袍飘飘然；有时向往侠客行径，晚上穿一套紧身的黑色夜行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也特有意趣……”

三 此部口述史作品上卷从刘绪贻出生记到1947年留美回国，其中大部分内容围绕着教育经历。刘曾求学于湖北省立高级中学，首任校长杨昭恕重视教学质量，对教材的选择不独讲究规格，有的直接用原书，一次在教师们因领不到工资罢课期间，刘绪贻将《范氏大代数》的全部习题翻译并解答出来，这可能是凤毛麟角，但确实让我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有新的认识。更令人瞩目的是清华大学对学生生活安排的体贴周到（刘在1936年入清华园）。“每间寝室住两个人，各有一床、一套桌椅、一书架、一衣柜。为防风沙，窗子有五层：最外层为竹帘，其次为百叶窗，再次为玻璃窗，玻璃窗上附一层白绸布，最里面是一层淡色厚布帘。此外，白天还有马拉洒水车不停地各条路上洒水防沙。报到时每人发有两个布袋，晚上将要洗的衣物装在袋内放在寝室门旁，第二天一大早便有人收了去，隔天早上，便可在原地取回盛有洗好烫好的衣物的布袋，而装有要洗衣物的另一布袋又被人拿走了……”今天各大高校的后勤部门，可能都无法提供这种“宾馆式”服务吧。清华如此爱护学生，究竟是要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教务长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的最大效用，并非养成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通专虽应兼顾，而中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尤应避免“专的过度”而造成“人格的畸形化”。今天中国各高校在倡言通识教育时倒不妨借鉴当年清华的具体措施：“大学的头两年不分院、系、专业，即使定了也可以随意转，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读至少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文法科的学生必须至少选读一门理科课程”，而名教授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都教本科生……“我投考清华时，遵父亲遗愿，报的是化学系；第二学年我为了提高自己英语水平，读了一年外国语言文学系；第三年我才决定转入我所喜爱的社会人类学系。并且选读了生物学……”刘先生成才，正是清华通识教育的成功范例。

卢沟桥事变后，刘绪贻回到武汉。身无分文，和几位北大学生以清华、北大同学的名义，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以解决生存问题。当招生广告在武汉市的报纸上出现后，清华有关部门特意致函武汉市清华同学会会长、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国桢，请他调查一下，究竟这个补习班的负责人中是否真有清华同学。“接着，我们就受到吴国桢秘书的通知，邀请我们某日某时到武汉市政府去见吴市长”……战火纷飞中清华办事依然一丝不苟，今日举着名校招牌的、形形色色的机构遍地开花，却不知有多少高等学府能像当年清华大学一般爱惜羽毛。西南联大已成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神话，回忆录、研究著述汗牛充栋，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此部口述史相关内容中提供的新鲜记述不多（颇值得推荐的是名师众生相中“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最让我难忘的倒是这样一个有趣细节：1936年，“正是我运交华盖之时”。从国家来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从家庭来说，椿庭已空，弟妹俱失学。从个人来说，由于家庭变故，不独1935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因阮囊羞涩而却步，而且幸遇的红颜知己也几致“他生未卜此生休”。此情此际，有一天在朋友处看到一本《中学生》杂志，其中有一幅丰子恺先生题名为“朝暾”的漫画，画面上一颗劲松，一片蓝色的湖水，湖外一轮初升的红日。松树上有个鸟巢，巢里飞出几只小鸟，向着红日展翅。湖上一只小船，船上几个健康活泼的儿童，奋桨划向红日。整个画面朝气蓬勃，生气盎然，显得前程无限，给人以强烈鼓舞，使人充满希望。“这幅画虽非徐悲鸿的骏马、凡高的向日葵，但却深深打动我的心灵”。于是向朋友要来，“自此以后，直到我1937年6月末离开清华南下，我总将它贴在我卧床靠近的墙壁上，晨起看它几眼，往往使我整日精神振奋；睡前看它几眼，往往使我整夜梦境安宁。我真记不清有多少回它在我痛苦失望之时给我以安慰和向往。北平沦陷，清华被日寇占领后，我再也见不到留在清华园的这幅画了，但我经常怀念它”。到蒙自后，刘在报纸上看到丰子恺

《箫声剑影》

先生当时流寓贵州省玉屏县，怀着试一试的心情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我对那幅画的深情，那幅画对我的意义，以及我失去那幅画的怅惘之情”。然而出乎意料，时过不久，刘绪贻就收到丰子恺寄来的一幅题名为“天空任鸟飞”的新画。画面上一个凉台，凉台上一个儿童打开鸟笼放走一只小鸟。“我体会先生意思是劝我要胸襟开阔，既可以搏击长空，扶摇九万里，又可以寄迹山林，悠然自得；不要作茧自缚，自寻烦恼。……这幅画我珍藏了三十多年，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偷走了”。从今人的眼光来看，比大画家给素昧平生的青年回信、赠画更让人吃惊的是，人和画竟然能如此亲密，“晨起看它几眼，往往使我整日精神振奋；睡前看它几眼，往往使我整夜梦境安宁”，初看之下未免觉得几分矫情。我想起沈从文先生在抗战中说：“从后面轰炸饥饿中来的，虽尽管形容枯槁，衣裤褴褛，却于神情中见出一种不惊、不惧，嘴抿得紧紧的也不声不响，感觉个人未来与国家未来，都可一身担当，都得一身担当。明白个人忧乐与国家荣枯分不开，脱不掉。”（沈从文：《谈苦闷》）。我们已渐渐远离那个“一身担当”的时代，个人与族群、国家、历史的那种生动、内在而健康的联系已被渐渐“分开”、“脱掉”，所以我们不太理解刘绪贻和那幅“朝暾”漫画的亲密，这种亲密中，倒兴许恰恰含藏着艺术、现实与个人最理想的互动关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